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一士类稿

徐一士◎著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一士类稿

徐一士◎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士类稿/徐一士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7-101-05610-5

I. 一… II. 徐… III. 掌故-中国-民国-选集
IV. K258.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712 号

书 名 一士类稿

著 者 徐一士

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¼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610-5

定 价 28.00 元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 and 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整理说明

先父徐一士，原名仁钰，字相甫，号蹇斋，生于 1890 年 11 月，卒于 1971 年 11 月。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籍江苏宜兴，其祖父徐伟侯道光年间进京赴试后人宛平籍，于丁未年（1847）与李鸿章同科中进士，并自此结为通家之好。父亲徐致愉 1870 年在京中举后分发山东任知县，举家迁鲁。先父于 1910 年毕业于山东客籍高等学堂，随后经清学部考试，授予举人出身（时称“学校举人”或“洋举人”，有别于科举举人）。两年后迁居北京，1924 年在北洋政府实业部（后改农商部）矿政司充任科员、主事。1928 年起，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担任编纂员，直到 1955 年退休。在早期任职期间，还曾兼任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补修社、北京国学书院讲师、教授。退休以后，经梅兰芳先生举荐，被北京市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

先父一生从事历史掌故的研究和著述，他自幼即喜读史书，他的学问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诲，父亲徐致愉对他的成长帮助最大，对他的教育是比较开放的，无论经史子集乃至

小说笔记,都为他讲解,启发他自学。他的三兄徐仁铎精通掌故,四兄徐凌霄博学多才,都对他有帮助。在高等学堂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精通英语,大大开阔了眼界。另一方面家庭的环境影响尤深,在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的二伯父徐致靖和堂兄徐仁铸、徐仁镜、徐仁録都是直接推动变法的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后罹重罪,“六君子”被诛,徐致靖因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等而列为首犯,未经审讯即被西太后判“斩立决”,只因李鸿章闻讯后鼎力营救,才改判“绞监候”,幸免为“七君子”之首,徐仁铸则被判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忧愤致死,遭到家败人亡之祸。维新变法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早在先父少年时期就打上深深的烙印,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改革之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方建,京、津、沪等大城市新出报刊有如雨后春笋,先伯徐凌霄与先父开始为几家报纸撰稿,从此均步入了新闻界。1913年,先父迁居北京市,就应《新中国报》聘为编辑,同年就任“报界同知会”编辑主任。他在《新中国报》发表中国近代史料文章后,由于资料翔实,立论精辟,很快在京师史学界引起轰动,众多报刊纷纷约稿,自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先后任《京津时报》、《日知报》、《京报》编辑,兼任《时报》、《国语日报》、《新申报》、《商报》、《四民日报》、《大公报》通讯,同时受《晨报》、《实报》和期刊《国闻周报》、《逸经》、《大风》、《中和》、

《古今》、《文史》、《国艺》、《大众》(分别发行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等聘为特约撰述。他终日伏案奋笔,乐此不疲,几至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四十年,在他多年的任公职期间,也未中断。

1929年7月7日,《国闻周报》(原发行于天津,后转在上海发行)第26期刊载了署名“凌霄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专栏,这是由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合作,由先父一人执笔,逐期发表的掌故文章,连载共八年,直到1937年8月9日第31期为止,由于上海沦陷而被迫中断。这是民国以来发表时间最长、篇幅最大(120余万字)、影响最深的近代掌故巨著。日寇占领北平后,先父暂时中断了写作,只在大辞典编纂处工作。然而祸从天降,1937年秋,日寇宪兵队突然来到宣南魏染胡同43号我家中,逮捕了先父,全家顿时惊慌失措。经五堂兄弟泽民(伯父徐凌霄之子)四下打听,得知缘于先父为香港《大风》杂志所撰稿中有反日内容。入狱近三个月,期间曾遭拷打。后经文化界知名友人力保出狱。经此大难,身体衰弱,原不打算继续写稿。但京、津、沪一些报刊仍不断向他索稿,文化界一些知心朋友也鼓励他继续撰写掌故文章,以飨读者。另一方面,中断了稿费收入,他以一人的微薄薪金维持当时八口之家的生活,的确难以为继,只得重新拿起笔来,应少数杂志报刊如《古今》、《中和》、《京报》、《实报》等之请,按时交稿。因有“前车之鉴”,下笔自然格外慎重,只写文史

类掌故文章。但他的爱国之心，修史之志，未曾稍泯。有两位友人当时在伪华北政府机关任职，目睹先父经济拮据窘状，先后劝他“出山”，协助他们工作，先父都婉言谢绝，表示自己年纪老了，不想为日本人做事，现在从事编纂辞书的工作很好，既可弘扬中国文化，又可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更有自己的乐趣，何必舍此乐而他求。

先父的著述虽丰，但对结集出版自己文章极其慎重，他尝对子侄们说：“出书不像在报纸上登篇文章，别人看过就忘，出了书就有人推敲了。我就怕有错误未能发现，个人名誉事小，廖种流传事大。”1944年，在瞿兑之、谢刚主等诸多挚友的督劝下，经过充分的准备，在上海文友周黎安先生的主持下，由上海古今出版社刊行了先父第一部掌故著作《一士类稿》（以下简称《类稿》）。1945年6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了另一部著作《一士谭荟》（以下简称《谭荟》），1948年《谭荟》又再版。这两部著作所述多是清末民初丰富多彩的名人轶事，书出后吸引了大批读者，也受到史学界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著作的合订本。在此后的20余年中，上海、四川、山西、辽宁、重庆等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合订本或单行本。90年代初，我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台北市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徐一士多种著作，又得知掌兄徐泽民早年的同事和好友林海音夫妇家居台北市，林女士在台北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我通过这层关系用书信

与林女士取得联系，她热情地帮助我和文海出版社的负责人取得直接联系。经过双方书信协商后，文海出版社不久即寄来几套先父著作的原版影印本，其中一本就是《类稿》、《谭荟》的合订本，它载入该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的第6卷，这是极为珍贵的资料。最近中华书局与长子徐禾联系，计划将先父的文史掌故著作收入《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使其广为传播，首先出版《类稿》和《谭荟》，并寄来二书的校样，嘱本人审校。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本人对此倍感欣慰。

据查，《类稿》原版收文章24篇，山西古籍出版社本由编者增加了徐一士所写《李经方》一篇。其“导言”中说：该文“原载《国闻周报》第11卷第41期，是述李鸿章之子的，有史料价值，且与本书体例一致，故附于最后，以飨读者。”因此，总计收文25篇。此次中华新版，不再收入《李经方》一篇。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类稿》，最后增加了《周跋》一文，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该文系周黎庵（劭）为《类稿》所写的校阅后记。周亦为著名的掌故家，与先父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他写此文是在《类稿》出版以后，所以未载入原书。我在辽宁版中发现此文，原题即为“周跋”，考虑文章确属跋文性质，且又稀见，特据此收入周文，亦作为中华版之跋。

《谭荟》1945年原版收文章30篇，1948年再版时不知何故改分为甲乙两编，甲编收文3篇，乙编收文14篇，共27篇，

在乙编中删去了《对外趣谈》、《西人之中剧观》、《戏剧琐话》三篇。近年出版的《谭荟》，有的版本也据此删去了这三篇；山西版编者除据再版《谭荟》删除上述三文外，另增加了除一士所写原载于《国闻周报》的《谈王小航》、《谈大小九卿》两文。此次新版仍恢复 1945 年原版所载上述三文，总计 30 篇，不再收入山西版两篇增文。此外，征得责任编辑的同意，此次新版在《类稿》中增加《曾国藩与李鸿章》、《谈李秉衡》、《谈黄侃》三篇，在《谈荟》中增加《樊增祥与易顺鼎》、《谈避讳》两篇（都是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发表过的），以饷读者。原版的两部著作内容都分别载于上海的期刊《国闻周报》、《古今》和《逸经》，先父从中精选了 54 篇，其中以写人物者最多，约占四分之三，而人物中又以军政要员为多，如肃顺、荣禄、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彭玉麟、段祺瑞、徐树铮、孙传芳等 20 余人；其次则为文坛学界人物，如王闿运、李慈铭、章炳麟、陈三立、廖树蘅、隆观易、张百熙等 10 余人；此外还有实业界的胡雪岩，戏曲曲艺界的梅巧玲、柳敬亭，名医薛福辰、汪守正等，这些篇章都可说是徐一士的代表作。其写人物，除广集翔实资料，详加剖析，去伪存真之外，对臧否人物极为慎重，坚持客观严正公平态度，绝不妄立一家之言，妄加褒贬。资料、判断有异难辨时，宁可存疑，或与读者商榷。叙述历史事件的，则有《类稿》中的《閩人掘藏事述》，《谭荟》中的《靖港之役》、《咸丰军事史料》、《庚辰午门案》、《庚戌炸弹案》数篇，读后可

使人对中国近代史某些事件增加了解。《谭荟》原版的最后三篇文章中,《对外趣谈》值得一读,可使人们对李鸿章的形象有新的认识。《西人之中剧观》、《戏剧琐谈》两篇对戏剧爱好者也会有所帮助。

关于本书整理问题,笔者主要根据寒斋所藏《类稿》、《谈荟》初版本,并酌情参考已经出版的其他版本,校改文字讹讹。整理工作或存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2007年8月20日

徐泽昱识于京寓亦佳庐

目 录

整理说明	1
瞿序	1
孙序	21
谢序	23
自序	27
王闳运与《湘军志》	33
王闳运与肃顺	57
湘绮楼之今昔	68
李慈铭与王闳运	74
李慈铭与周祖培	81
谈章炳麟	86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	96
太炎琐话	114

太炎弟子论述师说	123
左宗棠与梁启超	148
谈柯劭忞	158
谈陈三立	173
谈廖树蘅	180
谈隆观易	203
谈吴士鉴	208
谈陈夔龙	219
谈段祺瑞	240
谈徐树铮	247
谈孙传芳	253
谈胡雪岩	259
壬午两名医	288
吴汝纶论医	302
杭州旗营掌故	309
閩人掘藏事述	341
曾国藩与李鸿章	348
谈李秉衡	356
谈黄侃	362
周跋	369

瞿 序

徐一士先生最近就他的历年撰述抽编一部《一士类稿》，要我作一篇序，这是极荣幸而且极有意义之事。

因徐先生的文章而想到，所谓掌故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当先加以讨论。我以为中国正史与杂史的分途自宋始。我们读《史记》、《汉书》，觉得史家叙述一个重要人物，每从一二节上描写，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于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即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的发生、前后经过，著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于心。例如《史记》写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张良谏止一事。酈食其的话是有理由的，而张良的话举不出理由。但看他人见高祖时的偶然事态，以及仓促间借箸代筹的神情，挽回千钧一发的局势，就在他临机应变的几句话，可知当时彼此间的微妙心理。这样关系千古治乱的大事，就是这样诙谐似的被决定了。所以不但高祖与张良两个人的个性暴露无遗，而且可以将当时主张恢复封建与主张沿袭秦制的两派人心事和盘托出。司马

氏之所以为良史,正在于这些地方。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笔之人多少有一点公务的史职在身,而后代的文网较为苛密,加之私家的传说太多,不是公认的话不敢说,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据。因此虽然极好的史裁,也受了限制,不能像《史记》那样活泼泼地了。不过唐以前的史家,虽或不能尽情发挥,犹能于剪裁去取之间示其微意,使后人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例如陈寿《三国志》记高贵乡公讨司马昭一事,在本纪里面一字不提,而但载太后令及大将军上言,便是明明告诉后人,这两篇文章是一种掩饰之词,更足见高贵乡公之为冤死。所以照这样看来,后世史家所依据之官式史料,竟多难于置信,愈是史料完全的,愈恐难于置信。若是并完全史料而无之,则更不用说了。良史之苦心,不是细心体会,又有谁知道呢。

有许多的史料,不是史家所能亲眼看得到的,这种史料,不知埋没掉多少而成为千余年的煨烬尘土了。《文选》载陆机《吊魏武帝文》一篇,自云元康年中游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据其所采用者而观之,则当时史臣所收录者不但是一篇口传的令,而且将弥留顾命时的情形也都记了下来。甚至关于遗令的事后情形,也都有一贯的记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当其大渐时的言语,必不暇自己动笔作书,而必是尽职的侍臣,据实笔录,以供他日参考。而所说的话,又不是都可以公开以示四方的。所以只可存于秘阁,而成为一种秘密文献。

这一段记载,显示曹操的真性情以及其私人生活家庭状态之一斑,较之任何纪载更有价值。而陈寿作《三国志》时竟未采入,不知是未曾检阅到这件档案呢,还是认为无关于政治而略去不载。总而言之,不能不说史家对于史料之去取,虽良史不免有失当的地方。

正史杂史之分途,也可以说就从《三国志》启其端。《三国志》固以文笔严洁见长,而叙写事实亦不免有简略之失,为后世官修史书之徒,以勾勒轮廓为尽职的开一先路。至于杂史之多,也就起于三国。因为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处的纪载不同。有本处的事,非本处不能知的。有甲处的事,自己纪载不详,而转见于乙处、丙处的。其时宣传与反宣传的工作,都很厉害。例如《曹瞞传》是吴国人作来骂曹操的,我们知道他有作用,不敢十分相信,然而多少可以看出曹操之为人。又如陈群、华歆、王朗一般人寄书与诸葛亮,明明是代魏国劝降的文字,然而可以反映当时中原士大夫对于流亡在西南者之一种同情。推而至于一切琐屑的遗闻佚事,都有其所涵之意义。所以陈寿不采而裴松之采以为注。现在拿裴注与陈志合看,觉得有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的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杂史之不可废有如此。

自来成功者之纪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纪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